

# 论古代“文章学”的兴起与嬗变

宁俊红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 经义考试让程颐看到散体文章创作的兴盛、普及, 认识到文章与阐发经学义理密不可分, 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文章之学”。朱熹、吕祖谦等人则认识到从义理的角度阐发经典与围绕立意写作经义文章。他们在如何分析文章的篇章字句等方面有高度的契合, 由此他们也真正赋予“文章之学”切实的内涵。程颐将“文章之学”与“训诂之学”“儒者之学”并列提出, 也是对文、道分立的明确体认, 以此为契机, 明清文章学由关注法度向审美领域拓展。

**关键词:** “文章之学”; 程颐; 朱熹; 吕祖谦; 文章法度; 文道关系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6-0168-05

21世纪以来, 随着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历代文话》的出版, 学界对古代文章学的研究越来越关注。王水照、祝尚书、曾枣庄、吴承学等几位学者就何谓“文章学”、古代文章学何时成立、《文心雕龙》能不能算作文章学的开端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大都从文章学概念的界定入手, 分析古代文章学的内涵与确立时间。本文则从古人所提出的“文章之学”入手, 寻绎其发展脉络, 以期对相关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

魏晋南北朝就有挚虞的《文章流别志》《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等, 但是直到北宋, 程颐才明确提出了“文章之学”, 曰: “古之学者一, 今之学者三, 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 二曰训诂之学, 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 舍儒者之学不可。”<sup>[1](88)</sup>程颐虽然没有文章学的相关论述, 但他提出“文章之学”, 并将其与训诂之学、儒者之学相提并论, 这是他对所处时代散体文章创作兴盛、普及的敏锐总结。古代文章之学正是与北宋经义取士的科举改革关联而生, 其内涵也是在与训诂之学、儒者之学的并立、互动中不断深化、发展。

## 一、程颐明确提出“文章之学”的概念

程颐提出“文章之学”, 是古人关于文章学概念较早的表述。宋以前虽有“文章”的概念, 但是关于诗

文的论述主要是以体制、声韵等为核心。汉末六朝集中出现了关于文体的理论著述, 《文心雕龙》是其中较典型的代表。《文心雕龙》除了前五篇的理论枢纽之外,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两大部分: 一是文体论部分, 梳理了三十几种文体发展的源流, 并提出相应的创作原则。二是创作论部分, 除论及体性、风骨等理论问题, 也论及创作中具体的写作和修辞问题, 如声律、丽辞等。刘勰所注重的体制、声韵问题也是齐梁、隋唐以来作者所特别讲求的方面, 当时的诗格、文格类的著述中都体现出这样的趋势。如《文镜秘府论》载: “词人之作也, 先看文之大体, 随而用心。”并根据不同的文体提出要求: “至如称博雅, 则颂、论为其标。语清典, 则铭赞居其极。……凡斯六事, 文章之通义焉。”又曰: “先看将作之文, 体有大小。又看所为之事, 理或多少。体大而理多者, 定制宜弘; 体小而理少者, 置辞必局。”<sup>[2]</sup>都是要求写文章先从把握文章“体要”入手, 除此之外就是梳理声韵、声病、属对、用典等问题。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哲宗元祐元年尚书省言: “朝廷用经术设科, 盖欲人知礼义, 学探原本。近岁以来, ……为文者惟务解释, 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sup>[3]</sup>宋代经义取士以来, 声律、体要之学不受关注, 而它恰恰是之前唐代诗文创作最关注的方面。

《文心雕龙》中虽有一篇专论“章句”, 但与宋代以来文章学关注篇章字句的关联、安排仍有较大的差别。章句本义是分章析句的符号, 后来发展为以分章

收稿日期: 2016-04-23; 修回日期: 2016-1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五四前后的文话研究”(09XZW002)

作者简介: 宁俊红(1973-), 女, 山西新绛人,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批评史

析句为基础的传注体裁，是汉代经学著述的重要形式。龚千炎在《中国语法学史》中指出章句之学除了为读经、说经服务外，还跟汉语的特点紧密相关。语段分析对汉语语法研究非常重要，“汉语缺少形态变化，比较注重隐含和意念，因此对语言环境和上下文依赖较大。这说明，要想正确了解句义和语意，便必须从篇章语段中去分析体味。”<sup>[4]</sup>《文心雕龙》对章句的论述，是以章句之学为基础的，曰：“设情有宅，置言有句；宅情曰章，位言曰句。……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解释了章、句、篇的概念及关系。又曰：“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sup>[5]</sup>章句的安排要层次分明，全篇意义连贯。所以《文心雕龙》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认识章、句的基础上，对篇章字句的语法总结。而且仅从语法角度突出章句的作用，还未能认识到篇章结构的安排及与文章整体立意的关联等，就造成了章句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对立。徐干在《中论》“治学”篇中指出章句之学的弊端：“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sup>[6]</sup>章句之学拘泥于分章析句地解释原文，往往限制了对经典大义的理解、阐发。章句之学到唐代也没有太多突破，刘勰身处其中，《文心雕龙》对章句的阐发也会受到局限，只能停留在章句本身的语法作用上。宋代以来文章学的建立是以章句之学为基础的，但是又突破了汉代以来的章句之学，围绕“义理”建构起了自身的理论模式。

北宋以来，经学和科举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古文创作的兴盛、普及，是程颐提出“文章之学”的关键。唐代明经科考试“帖经”“墨义”，与章句、传注之学相适应，只是对原文、注释的背诵、默写。这一状况从北宋庆历年间逐渐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变化的背后是经学的突破，同时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又促进了散文文章创作的兴盛、普及。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指出：“自汉儒至庆历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sup>[7]</sup>庆历后诸儒即指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他们在突破章句、传注的同时，也主张改革与此相对应的帖经、墨义等考试制度。庆历三年，

仁宗数令条奏当世务，范仲淹条陈十事，“三曰精贡举”：“国家专以词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其取士之科，即依贾昌朝等起请，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sup>[8]</sup>于是仁宗下诏罢帖经、墨义，试以策、论、经义等。范仲淹不久失势，这一规定虽未能持续下去，但是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古文复兴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吕祖谦曾言：“庆历中范文正公、富郑公、韩魏公执政，欲先试论、策，使工文辞者言古今治乱；简其程式，使得以遑问以大义，使不专记诵。自是古文渐复一年。”<sup>[8]</sup>欧阳修也曾主张：“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文献通考》引欧阳修上述言论，又加按语曰：“欧公之言，欲先试论、策，择其十分乱道者先澄汰之，不特使之稍务实学，且使司衡鉴者所考少则易精；又既工论、策，则不患其不长于诗、赋，纵诗、赋不工，而所取亦不害为博古通经之士矣。”<sup>[9]</sup>特别指出了论、策写作与博古通经的关联。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贡举，罢黜险怪奇涩之文，场屋之习随之一变，进一步推动了古文写作的普及。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也说：“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息。”<sup>[10]</sup>经义取士注重对经典义理的阐发，突破了汉唐经学的章句、传注模式，促进了理学的发展；且此后几百年，议论性的经义文章成为科举取士的主要内容，与唐代诗赋考试所形成的注重格律、“合体”的氛围不同，经义文章写作更多考察士子如何通过文章阐发义理，推动了整个社会对散文文章写作的重视，也催生了对经义文章创作的理论探讨。程颐是王安石的同时代人，虽然视王氏新学为异端之学，但是经义考试让他看到散文文章创作的普及与兴盛，认识到如何写文章与阐发经学义理密不可分，所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章之学”，将其同“训诂之学，儒者之学”相提并论。

## 二、朱熹、吕祖谦等赋予“文章之学”切实内涵

程颐只是提出“文章之学”的概念，真正赋予“文章之学”切实内涵的是南宋的理学家。朱熹、吕祖谦

编《近思录》，辑录和了解了程颐关于“文章之学”的论述，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义文章的写作渐趋成熟，他们亲身参加科举考试，也积累了对文章创作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经典也是文章，他们意识到从义理的角度阐发经典与围绕立意写作经义文章，二者在如何认识、分析文章的篇章字句方面有高度的契合，由此也开启了全新的文章学理论探讨模式。

汉代以来的章句之学有不顾通篇、破碎义理的弊端。北宋庆历以来对经典的研究开始注重自由阐发义理，至朱熹彻底改变了重训诂轻义理的风气。《四书章句集注》确立了“义理”的核心地位，重视义理阐发的血脉贯通，这一认识也是文章学内涵建构的起点。比如朱熹从文章义理的“血脉贯通”考量，对《大学》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大学章句》经文部分的注释中专门有分别序次的说明：“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此结上文两节之意。”“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又“此两节结上文两节之意”。对于传文亦是如此，曰：“其传十章……旧本颇有错简，今依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序次的依据便是义理是否前后贯通：“凡传文，杂引经传，若无统纪，然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sup>[11]</sup>

朱熹以义理为核心考察经典的篇章结构，注重血脉贯通，对于文章的写作，尤其是经义文章的写作，也是从这个角度考量的。《朱子语类》有对文章学理论的明确总结，曰：“夫所贵乎文之足以传远，以其议论明白，血脉指意晓然可知耳。”<sup>[12]</sup>道理明白、血脉贯通，这是朱熹所总结的文章学最基本的内涵。要想所论述的道理血脉贯通，就需要布置，需要法度，曰：“如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某旧看二家之文，复看坡文，觉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sup>[12]</sup>苏文欠句、欠字，难以寻绎文章脉络，觉得少了布置，血脉不能贯通。又曰：“陈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黄楼铭》，当时诸公都敛衽。（佐录云：便是今人文字都无他抑扬顿挫。）”“曾司直大故会做文字，大故驰骋有法度。”<sup>[12]</sup>这些都是对法度的推崇。法度、布置并非单纯的文章形式问题，朱熹曰：“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大率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sup>[12]</sup>这“二三分文”就是布置，必须是围绕说明白道理展开的。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围绕具体文章分析如何布置，在这方面阐发得更明确。

吕祖谦虽没有如朱熹那样细致地阐发经典，但是对经典的解说也偏重以义理为核心梳理其章法，《左氏传说》《丽泽论说辑录》皆是如此。如解说《孟子》，

“‘于我心有戚戚焉’‘独何与’‘王请度之’，皆是孟子警梁王切处。孟子此章一开一合，故其言易入而警人深，细观节次便可见。政如医之治病相似，王曰于我心有戚戚焉，若非节节发之，此心何自而发，自恒产恒心以下，方教之以药方。”<sup>[13]</sup>以“警语”“节次”观孟子如何立论、阐发道理，也是在义理与篇章字句的关系基础上解说经典。吕祖谦对义理与文章关系的认识，也体现在对散体文章的评点中。吕祖谦编《古文关键》，通过评点唐宋诸家的六十余篇文章，提示学者作文的门径。从卷首的论述来看，吕祖谦也最重视文章的血脉贯通：“文字一篇之中，……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間然后可。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血脉贯通的方法主要在纲目、关键、句法等等，曰：“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sup>[14]</sup>他特别强调“主意”，篇章结构的首尾相应、铺叙次第、抑扬开合等等都是围绕“主意”来布置、安排。如评韩愈《获麟解》曰：“其抑扬开合，只主‘祥’字，反覆作五段说。”<sup>[14]</sup>围绕“祥”立意，安排抑扬开合的结构。又如评欧阳修《纵囚论》曰：“文最紧，曲折辩论，惊人险语，精神聚处，词尽意未尽。”又曰：“此篇反覆有血脉。”<sup>[14]</sup>《纵囚论》围绕立意，曲折往复辨析又能血脉贯通，才会有“词尽意未尽”的表达效果。又曰：“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翦截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sup>[14]</sup>从具体的评点来看，警策、句法也都是就全篇立意而论的。所谓“一篇警策”，是指对于全篇意思表达最具警醒意义的句子。如韩愈《谏臣论》中“夫天授人以圣贤才能”一句旁批曰：“最警策，切当之尤也。”<sup>[14]</sup>句子的转换、起结有力，都是为了纲目分明，意思血脉贯通。如韩愈《师说》“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是句意转换处，批曰：“说得最好，又应前吾师道处意，纲目不乱。”<sup>[14]</sup>以立意为主，围绕立意展开篇章结构及字句的安排，这是南宋理学家在认识到义理与文章紧密相关的基础上所总结的文章学的基本内涵。

注重围绕立意安排篇章字句的文章创作技法，南宋以后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宋末元初刘壎所著《隐居通议》就明确指出：“凡文章必有枢纽，有脉络、开合、起伏、抑扬，布置自有一定之法。”<sup>[15]</sup>随着文章技法的认识越来越成熟，明代出现大量文章学著述，如高琦的《文章一贯》、庄元臣的《论学须知》等，对文章如何立意、安排篇章字句等都有较系统的论述。

随着文章学篇章字句技法理论的成熟，其理论观念也由古文向其他体裁延伸。在文章学这一外延中我

们不仅能更清楚地认识其内涵，也能从一个侧面体认文章学建构的独特基础，与文体学有明显的区分。文章学讲求围绕立意安排篇章结构，技法与意义相关联，所以在小说、戏曲批评中出现围绕字法、句法、章法的运用来探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安排等相关联的理论批评。郭英德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就指出：明人吸取文法论的成果，在小说、戏曲的序跋评点中对作品“顿挫”“转折”等结构手法都有评论。“清人金圣叹、李渔、毛宗岗、脂砚斋等，在明人的基础上，对戏曲、小说结构布局的文法、章法，作了详尽的分析，构成了中国古代戏曲、小说情节结构论的主干。”<sup>[16]</sup>以金圣叹为例，他有古文、诗歌、小说及戏曲的评点，不同文体都能从篇章字句的角度分析其技法。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读法》曰：“如《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sup>[17]</sup>金圣叹是将《水浒传》当作一篇大文章来看，对于《水浒传》篇章结构的安排也有具体的论述。《水浒传》第九回回评曰：“夫文章之法岂一端而已乎？……夫文自在而眼光在后，则当知此文之起自为后文，非为此文也。……必如此，而后读者之胸中有针有线，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经有纬。……如酒生儿李小二夫妻，非真谓林冲于牢城营有此一个相识，与之往来火热也，意在阁子背后听说话一段绝妙奇文，则不得不先作此一个地步，所谓先事而起波也。”<sup>[17]</sup>金圣叹论述了《水浒传》为表现林冲遭人陷害又防不胜防之意，及在文章中暗生波澜的篇章之法。散体文章重视单字对文章结构的提贯作用，金圣叹评小说也重视此类。第九回回评曰：“此文通篇以‘火’字发奇，……同是火也，而前乎陆谦则有老军借盆，恩情朴至；后乎陆谦，则有庄客借烘，又复恩情朴至；而中间一火独成大冤深祸，为可骇叹也。”<sup>[17]</sup>“火”字提贯全篇，人情世态也在对比中凸显。

### 三、明清“文章学”由法度向审美领域拓展

程颐将“文章之学”与“训诂之学”“儒者之学”并列提出，也是对文、道分立的明确体认。程颐曰：“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sup>[11(75)]</sup>道与文有形上形下之区分。朱熹曰：“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sup>[12]</sup>理学家将文与道分立，才能真正从文章本身出发认识其自身特点，尤其是形式方面的特征，前述朱熹、吕祖谦对篇章字句分析的重视，与他们将文

章与儒道分立的观念切实相关。同时，文道分立也并非割裂了文道关系，朱熹批评苏东坡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sup>[12]</sup>道为根本，文出于本心，实质是在肯定文章形式、内容独立性的同时，也将文道关联的思考从形式、内容等方面转移到了创作的主观层面，即道与文的关联要通过作家“先理会得道理”来实现。宋代理学家对文道关系思考的深化，重视了作家环节，而文章只有有了作家主体的参与才能进入审美领域，这也是明清文章学审美理论发展的重要契机。

宋元间人李淦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他在《文章精义》中对文法与作家的关系已有所阐发，曰：“古人文字，规模间架，声音节奏，皆可学，惟妙处不可学。譬如幻师塑土偶也，耳目口鼻，俨然似人，而其中无精神魂魄意，不能活泼泼地，岂人也哉？”<sup>[18]</sup>文法之妙，是对文章技法之灵活运用，要有作家个人的精神参与其中，才有活泼、动人之美。明代，受心学影响，作家性情也受到明确的重视，文章学的审美理论得以发展，其中唐宋派的理论最突出。唐顺之曰：“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sup>[19]</sup>对于文章的篇章技法，唐顺之有明确的认识，即所谓“开合首尾经纬错综之法”<sup>[19]</sup>，同时也强调作家性情的流露才是文章审美的核心，唐顺之称之为“本色”。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在对作品的评论中也体现了这一理论。《文钞序》曰文章“工不工则又系乎斯人者之禀，与其专一之致否何如耳”<sup>[20]</sup>，作家的性情、禀赋与学问用功之处不同都会影响到文章之工拙。如韩愈主张文章创作务去陈言，篇章字句多跌宕、奇崛，茅坤评其《曹成王碑》曰“文有精爽，但字句生割，不免昌黎本色”。<sup>[20]</sup>“昌黎本色”是茅坤对韩愈散文审美风格的总结。茅坤的评论着眼于作家性情的抉发，但面对作品仍要从立意、结构、字句等方面入手，从中可以看出文章审美理论也是以篇章字句技法为基础的，是文章学基本内涵基础上的发展。

在文章、道、作家三者的关联中，明代人只关注了文章与作家，对“道”有所忽略。清人的认识则更为系统，且将“道”具化为义理、考据，更注重义理或者学术方向对作家精神、性情的养成，以及在文章中的体现。郭绍虞先生指出：义理、考据、词章三位

一体的文学观,“这是清代一般文人学者共同的主张,而其意自顾黄发之”。<sup>[21]</sup>郭先生认为黄宗羲已明白地说明此三者合一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文道合一。黄宗羲认为:“学统不离道,文统不离学,即是以文兼道,以道兼文的说法。”黄宗羲如何以文兼道呢?郭先生认为,“《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引梨洲说云:‘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所以他所谓道,都是从心体会,都是有得于己的。因此,道即是他的思想,他的人生观,他的哲学。本其从心体会会有得的以行而为事,以发而为文,所以能以文兼道。”<sup>[21]</sup>郭绍虞先生阐发得很明白:黄宗羲是以道为根本,将对道的体认化为思想、哲学、人生观,然后表达在文章中。这也是清人的普遍观念。阳湖派也强调学术上的独立见解使他们在为文方面能有以自立,张惠言云:“古之以文传者,虽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故其言必曰道。道成而所得之浅深醇杂见乎其文,无其道而有其文者,则未有也。”<sup>[22]</sup>他们要确立道对于文的根源作用。学道要穷究于经史,还要将对道的思考与现实相关联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认为以此为基础的创作才能传于后世。

#### 四、结语

从字面意义理解,“文章”可以包含诗、赋、古文,甚至小说、戏曲等等,“文章学”可以指一切有关文章的学问,文体论、声律论、技法论等等都应包含在内。但是从古代的实际来看,古人有明确的“文章学”概念、内涵是从宋代开始的。程颐从学问的高度将文章学与儒学、训诂学相提并论,而且这里的“文章”很明确是散体古文,程颐应是认识到散体古文创作的兴盛、普及,尤其是它在阐发儒家经典义理时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在政治、儒学发展的背景中定义“文章学”的,这是研究古文创作技法的文章学能成为学问的关键。否则,如今天仅从文学或修辞学的角度考虑问题,程颐不可能提出“文章之学”,“文章学”也不可能后来的发展。朱熹、吕祖谦等也是认识到从义理的角度阐发经典与围绕立意写作经义文章,二者有高度的契合,以此为基础确立了“文章学”的基本内涵。明清“文章学”由法度向审美领域拓展,也是以理学家对文道分立的深入思考为契机。因此,本文

的研究不仅展现文章技法理论、审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要梳理古人文章学兴起、嬗变背后的理论依据,及其与政治、儒学的密切关联,这应该才是古代文章学的实际。

#### 参考文献:

- [1] 程颐,程颢.二程全书[C]//四部备要·子部.上海:中华书局据江宁刻本校刊,1936.
- [2] 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333-339.
- [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0:8858,3435-3436.
- [4]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修订本)[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20.
- [5] 刘勰.文心雕龙注释[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75.
- [6] 徐干撰.中论[M].黄素标点.上海:泰东书局,1929:4.
- [7] 王应麟.困学纪闻[M].翁学哲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774.
- [8] 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9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902.
- [9] 马端临.文献通考[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61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68-669.
- [10]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301.
- [1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4.
- [12] 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3] 吕祖谦.丽泽论说辑录[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70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87.
- [14] 吕祖谦.古文关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5] 刘埙.隐居通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3.
- [16] 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497-498.
- [17]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 [18] 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187.
- [19] 唐顺之.重刊荆川先生文集[C]//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 [20]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3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1]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407-408.
- [22] 张惠言.茗柯文编[M].黄立新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17.

(下转第194页)